

從孫中山王道理念論中國大陸 「一帶一路」戰略思維

著者／中校副教授 許世宗

現為海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中校副教授

隨著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各國關係日益密切，世界經濟和區域局勢關係更為複雜。中國大陸借用古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和集體記憶，以及深具凝聚力的文化基因，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合作倡議。「一帶一路」建設高舉和平發展旗幟，旨在弘揚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等精神；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以及文化包容的利益、命運、責任共同體；利用國家現有的雙、多邊機制和區域合作平臺，積極地與沿線國家和地區民心相通，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孫中山將王道文化加上現代的詮釋後，取代強權的霸道，作為處理國與國關係的最高準則，實現和諧、平等、合作的世界大同新秩序。特別是在其於1924年〈大亞洲主義〉的演說中，呼籲當時日本勿走霸道文化路線，應團結亞洲所有國家、振興亞洲文明和價值，共同對抗西方列強的壓迫。「一帶一路」不是以武力壓迫沿線國家或地區就範，而是以和平手段感化人心，包容不同國家或地區在意識形態、文化、宗教、歷史、語言等的差異，蘊含著中華文化的王道思想。孫中山強調的王道理念與中國大陸實踐的「一帶一路」雖有差距，但心態上，與平等互惠、相互尊重等原則是高度契合；政策上，與和平發展、睦鄰政策、國與國合作、雙贏等政策有高度相合之處。綜上，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堅持走王道與大同理想，有別於「西方標準」的優越心態，凸顯孫中山的王道理念有其超越時代的獨到眼光與遠見。

壹、前言

中華文明中儒家思想的「和為貴」、「和而不同」；老莊思想的「去兵」、「不以兵強天下」；墨家的「兼愛」、「非攻」等，都充滿著和平的王道精神。延伸到天下秩序的朝貢體系，就是古代的世界主義，即是不用武力去壓迫或消滅別國，而是用王道文化去感化各弱小民族來進貢，進而

自願歸化。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有根源於中華民族固有的道德，深具中華文化特色，蘊涵深厚的世界主義；其中也有汲取歐洲現代的人道主義與互助論思想，避免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種族偏狹和帝國主義恃強凌弱的強權邏輯。像高麗幾千年來雖是中國的藩屬，實是獨立國家，未被消滅；近代日本強盛後，效法西方國家的侵略，

將高麗滅了。

孫中山的政治理想中認為，對於集文明與強權於一身的西方文明，接受其自由民主，但反對其霸權的社會觀和國際觀。孫中山強調：「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擔負一個大責任。」¹換言之，國內，中華民國要以民族主義建國，促進國內各民族的團結與身份認同，共建共同的族群和文化，恢復強盛的文明大國地位。國際上，孫中山反對西方國家講打不講和，專講強權不講公理，喜好用武力手段去征服其它少數民族或國家。這種專講強權的行為，只是會產生反叛效果；反觀用王道文化，具有「濟弱扶傾」的傳統，與友邦增進睦誼，承擔大國對世界的責任，可達萬裡來朝，使世界漸趨於大同。

大國之偉大，不在經濟與軍事之富強，而在價值理念。孫中山具現代意識與世界眼光，他的王道理念集熔傳統與現代於一爐，不僅包含固有道德、知識和能力；同時，認同歐美的先進文明，讚揚日本明治維新後現代化的成就。另一方面，孫中山反對富國強兵後，像日本稱霸東亞，奉行強權與蠶食鄰國的軍國主義，以及「脫亞入歐」之國策。孫中山的王道理念是中華

文化的王道思想與歐洲互助論結合的產物，其思想跳脫國別的局限，以人類整體為對象，對東西方文明的不同性質進行高度概括的經典之語。²本研究動機，企圖從孫中山的學說事蹟中，發掘孫中山如何將王道文化，加以現代詮釋後之理念，作為處理國與國關係的最高道德準則，試圖形成和諧、平等、合作的新格局與新秩序，以實現世界大同。

嚴復說：「世上只有不富強之王道，沒有不王道之富強。」換言之，離開了王道談富強完全是虛的，就會求仁反不得仁。³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綜合國力、民族凝聚力、國際影響力不斷騰飛，與世界關係更緊密、相互影響更深、相互作用更頻繁。中國大陸正面臨複雜的國內、國際局勢，其崛起易被解讀為與世界歷史上任何大國的崛起相同，為自身利益與強盛，對外實施擴張和掠奪，謀求建立霸權。中國大陸提出「一帶一路」戰略，為謀求富國強兵；同時，為避免國際認為中國的崛起是威脅，中共提出一條兼具王道和富強的開創道路。本研究目的，在爬梳孫中山的「王道理念」和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戰略，得到中國大陸正面臨國家現代化和安全的重要時刻，中國大陸需要以道德感召世界。

1 孫中山，〈民族主義（第六講）〉，《國父全集（第一冊）》，秦孝儀主編（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頁53。

2 武心波，〈王霸之辯與中國「軟實力」的戰略構想—從孫中山的「王道觀」談起〉，《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8年，第4期，頁100。

3 韓毓海，〈富強和王道結合之路〉，《跟毛澤東學管理》，2014年1月，第114期，頁80。

*海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中華民國兩岸關係發展協會孫學研究中心榮譽副研究員

因此，中國大陸採取將「一帶一路」戰略建立在孫中山的「王道理念」基礎上，才能建立一個文明而富強的崛起中國，進而達到濟弱扶傾的真正富強。

貳、王道與霸道之天下觀

《禮運》〈大同篇〉是儒家國治、天下平的最理想寫照，孫中山所談的「天下為公」、「講信修睦」、「世界大同」等境界，都是出自於此。孔子視王與霸為政治演進過程中的不同階段，即霸會逐漸上升到王的階段。荀子把王霸看做不同等級之德行，理想的政治叫做王，次等的叫做霸。「明確提出「王道」與「霸道」之辯的是孟子，其一生都在遊說諸侯國王，推行「王道」，以圖使他們受其影響而實現仁政。兵法說：「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⁴王道、霸道之論，起於倫理道德脆弱化、禮儀規範邊緣化、動亂戰爭經常化、仁義廉恥缺失化等，造成周王朝與諸侯國間、或諸侯國與諸侯國間、或諸侯國內部君、臣、人民間的關係危機，導致人民無以安居，天下無有太平。⁵綜上，

王道與霸道是中國傳統對外關係的行為取向，是以德服人，還是以力服人，逐漸成為德與力的代名詞。

一、王道思想

儒家宣揚並奉行王道，王道的核心是行道義、講禮義、舉義士、行義法、有義志；儒家霸道的核心是重信用、講法律、令行禁止、取信於民、取信於鄰。政治行為沒有任何規則，若只貪求自己國家的利益，不講禮義，人們間相互欺詐，整個社會分崩離析，鄰國間互不信任，彼此猜忌，國家即使強盛，也是一時而已。⁶

王道之說，起於孟子，源於孔子。老子在孔子之後，莊子與孟子同時，均有對應的論述。儒家政治哲學，幾無宣導戰爭概念，孔孟思想對世界秩序具正面理想，即孔子所提倡的王道精神。王道就是用說理而非動武的方式來解決問題，認為以武力要人就範，不足以服人心，唯以德才能服人，王道精神成為最高的政治理想。⁷

西周時，「天下」兩字的思想被演繹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⁸顯見，王道的理想目標宏偉，希望統治的天下是無所不包，無邊無際，不

斷延伸。王道的權力來源，主要有二：一是觀念上的天命觀；⁹二是制度上的宗法制、分封制。¹⁰所以，王道的權力來自於天命觀和宗法制、分封制，一個是觀念上，一個是制度上，兩者一起作用形成王道的權力來源。換言之，王道的目標是建立起天下絕對權威的王制，希望建立的政權是天命高高在上，普通百姓對天子產生敬畏，達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¹¹

儒家思想在 11 世紀的唐宋就發生大變化，儒家從經學釋放出來，變成理學和新學。「王道」就成為保持一顆老百姓的平常心，始終和百姓同甘苦共患難；「大同」就是我心即是民心，養我心就是養我民，與民同心、思維大同。¹²王道的運用使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王的德威遠播四海，天下大同。帝國向四周傳播德治教化，逐步形成一個中華出自於中央，其他異民族異地域為階梯同心圓，一元性統一的世界秩序。¹³

綜上，儒家道義與王道精神所建立的「天下秩序」未必能夠比現代國際秩序更好，或更有效地維護世界和平。需要將儒家的王道思想與西方的現實主義理論相結合，

融入國際主流價值，才能讓國家提高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從而完善現代國際秩序。因此，王道的運用是把「德」作為一種主要的政治手段，依靠「德」服，「力量」只是輔助作用，理想境界是保持「力」而不真正行使。所以，「王道」就是天下不爭時，以德化之，同時保持力量的優勢，「力」只有「德」無法達到應有作用時才使用；此時「力」的運用，無法像德服一樣達到心悅誠服，¹⁴故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力」保持威懾而不真正行使。

二、霸道思想

霸道謀求的目標與王道是不同；霸道不可能像王道，對外有強大的吸引力；霸道只能靠力，透過富國強兵增強自身實力，從而保持強大的威懾力。西周時，周天子行王道於天下；春秋時，則行霸道於天下。儒家談「霸道」，講信用；法家也宣揚「霸道」，不講信用，顯是名同而實異。商鞅說：「國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力也。」¹⁵國力要強盛，需要富國和強兵，富國是強兵的基礎。秦統一六國，代表奉行「霸道」的成功；另一方面，「霸道」政治使秦迅速崩潰。漢代政治的特點是「霸、王道」

4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531。

5 《說苑·政理》。

6 張立文，〈王霸之道與和合天下〉，《學術前沿》，2016年10月，下冊，頁79。

7 梁啟雄，《荀子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38。

8 汪榮祖，〈以王道取代霸道：中國崛起在世界上的角色〉，《國際漢學》，2017年，第3期，頁25。

9 劉恩恕、劉惠恕，《中國近現代疆域問題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年），頁12。

10 陳江風，《觀念與中國文化傳統》（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20。

11 樊樹志，《國史十六講》（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30。

12 《尚書·洪範》。

13 韓毓海，〈富強和王道結合之路〉，《跟毛澤東學管理》，2014年1月，第114期，頁80。

14 陳劍鋒，《文化與東亞、西歐國際秩序》（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23。

15 陳廷綱、周鼎，《天下·世界·國家—近代中國對外觀念演變史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頁28。

16 高亨，《商君書注譯》（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182。

雜之，主流上是法家政治。漢武帝以後，政治以儒為主，以法為輔，是王道政治。顯見，「霸道」適於亂世，是富國強兵之策，也是亂世圖存之道；「王道」適於治世，是安定人心之策，也是長治久安之道。

「霸權」這個詞彙是近代傳入中國大陸的舶來品，中華民族傳統王霸觀中的「霸」不同於西方所講的霸權。歐洲敬重馬基維利（Niccol Machiavelli, 1469-1527），與中華民族的「霸」迥異。華人對「霸」的否定包含強烈的情感因素：「任何事物只要冠之以霸，都會遭到唾棄與憎惡，中國政治文化對被認為是恃強凌弱的行為具有強烈的反感，而且認為弱者絕不應屈服於強者。」¹⁷中國大陸現代化的過程，縱觀西方國家發展的歷程，批判西方的「國強必霸」，摒棄西方霸權邏輯的擴張主義；反而強調中國大陸「永不稱霸」，不會對外擴張、積累財富、推行霸權、實行帝國主義，走一條和平發展的道路。此外，日本明治維新後國力日漸強盛，為開拓市場，掠奪更多的資源，遂發動對外侵略戰爭。¹⁸這種侵略行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西方列強的支援，如美國希望日本充當

其侵略中國的馬前卒，英國企望日本牽制俄國，德國和法國預想趁日本侵華獲取新的利益。¹⁹

綜上，歐美列強的帝國主義和日本的亞洲主義，是如此地沆瀣一氣，遮蔽不了他們罪惡的本質。時至今日，王道與霸道易被貼上好與壞、和平與戰爭、文明與野蠻的標籤，甚至與西方霸權做聯結。實事上，王道與霸道是交雜在一起，如：某些國際規則是由少數霸權國家的強權所致（稱為霸道的體現）；某些國際規則卻能直接表達國際社會多數成員的要求和利益（此為王道之舉）；甚至有些是王道與霸道混合而成。²⁰

三、朝貢體系下的天下觀

古代帝國間邊界模糊，帝國的壯大與否，取決於軍事實力；疆域的大小，取決於武力擴張。「霸道」是以武力做後盾來處理國內和國際關係。「霸道」不是中華民族對外關係的主流，處理周邊民族關係時，「霸道」往往不能順利施行。「王道」是以文化為依託，利用和平手段，在國際間建立信任關係而擴大自己的影響。簡而言之，前者主張「以力服人」，後者主張「以德服人」。²¹

戰爭是為制止更多戰爭，即使要戰爭也要進行義戰。王霸觀是古代中國處理對外關係時的重要理念和行為取向，是以德服人或是以力服人。對外用德，慎用武力，中華民族因宗支不斷地融合，人口逐漸繁殖，國家領域相隨擴張。若有外來武力侵略，擊破國家防線，影響民族生存的領域，則會激起民族共禦外侮，以保障生存。中國文化也許是「霸道」之後才有「王道」，相對西方文化，早在兩千多年前便已告別霸道，步入王道時代，是文化早熟的民族，而當下的西方還停留在霸道時代。²²

（一）天下觀

錢穆認為：「羅馬帝國是靠一中心的力量通過強力向四周擴散，而中國則是由四維的優秀力量共同參與構造一中央，從而形成了中國文化輝映千古、光環不絕。」²³中國古代只有天下的觀念，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國家觀念。天下體系看似存在「中心一週邊」的朝貢結構。²⁴天下觀構成古代中國的世界秩序觀，一整套關於對外關係的思想體系，使古代中國成為東亞政治、文化、經濟乃至安全秩序的主導者。儒家天下主義是一種特殊的秩序，是以儒家的仁義禮智價值為基礎而建構的。即各國共

同遵守協議和體系秩序，如：不對鄰國進行不義之戰，不容許隨意變更它國統治者等。若一國行為違反公認的行為準則，如對共同的國家元首（周天子）不敬，對本國百姓過於殘暴等，其他國家可在霸國的主導下，主持公道，進行討伐。²⁵換言之，「天下」經長期發展形成一個功能完備的「朝貢體系」，歷史上發揮重要功能；其中冊封和朝貢制度，某種程度上，是傳統霸道與王道的結合，以王道核心的「禮制」，建構起一種制度，形成對周邊穩定與發展的秩序。

（二）朝貢體系

秦漢後，演變出朝貢體系（Tributary System），自成體系，是以中華帝國為中心而向外擴散的同心圓，與中華文化愈相近的國家，處在離中心愈近的同心圓裡，如韓國、越南；外圈如日本，再外圈就是文化上更遠的國家。歷朝歷代在東亞地區確立了朝貢體系，授予周邊朝貢國金銀印章，成為天朝藩屬，定期派遣朝貢使向皇帝稱臣納貢，中方並提供政治承認、優惠貿易、安全保證等。這個天下一朝貢體系在鴉片戰爭後，儒家的天下秩序面臨西方文化衍生出來的現代國際秩序的挑戰。

17 但興悟，〈中西政治文化與話語體系中的霸權—中西霸權觀比較〉，《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年，第9期，頁15。

18 嚴孟達，〈甲午再現風雲〉，《新加坡聯合早報》，2014年2月8日，<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9CaKrnJEcgP>（檢索日期：2020年8月10日）。

19 陳安傑，〈和平發展道路：中國走向未來的歷史謀劃〉，《雲南行政學院學報》，2015年，第2期，頁91。

20 王逸舟，〈全球政治與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頁158。

21 武心波，〈王霸之辯與中國「軟實力」的戰略構想—從孫中山的「王道觀」談起〉，《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8年，第4期，頁102。

22 武心波，〈王霸之辯與中國「軟實力」的戰略構想—從孫中山的「王道觀」談起〉，《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8年，第4期，頁102。

23 錢穆，〈國史大綱〉（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頁13-14。

24 高飛，〈近代國際體系的結構與未來國際體系構建—東亞地區的視角〉，《國際論壇》，2012年，第2期，頁51。

25 葉自成，〈地緣政治與中國外交〉（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頁258。

朝貢體系這概念包含宗主國和朝貢國兩個相互對立的行為體，主要是古代中國中央王朝與周邊國家、民族地方政權、部落之間的交往體系。這一體系具體表現為朝貢國與宗主國間的雙向交往與聯繫，即朝貢國對宗主國的「稱臣納貢」，宗主國對朝貢國的「冊封回賜」。學者黃枝連在《天朝禮治體系研究》中提出：「古代中國王朝在區域關係中具『天朝』核心地位，考察古代東亞甚至亞太地區的區域秩序，正是以華夏禮治和『王道外交』主導區域關係，影響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²⁶日本學者濱下武志在《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一書中直言：「朝貢的本質就是商業貿易行為。」²⁷顯見，朝貢體系是華夏中心主義，不僅是區域經貿關係，也是軍事同盟、維護秩序穩定和重要的外交制度。

綜上，古代中國同周邊關係的發展，單純的霸道並不能真正實現對周邊民族的長久管理，而王道才真正能夠通過感化吸引，使周邊民族能夠心悅誠服的歸順，融入制度化的秩序中。事實上，古代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實例，證明「王霸並用」的歷史傳統。儒家學者趙汀陽比較春秋時期

的天下秩序和後來演變成的朝貢制度是一個比現代國際秩序更公正、更和諧的國際秩序。天下一朝貢制度基於儒家傳統中，以「家」為中心地位，「家」是建構國家和天下制度的範本，每個人都不是完全獨立，都承擔著互補性的角色和責任，包容各種不同的文化，沒有西方文化中的民族衝突。²⁸現代西方價值強調完全獨立的個人人格，以西方價值為基礎建構的民族國家主權制度同樣建立在獨立的民族一國家的基礎上，不強調人與人間、國家與國家間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導致國家與國家間過度競爭、合作不足。所以，當今世界非常需要建構以天下秩序一朝貢體系為範本的世界制度，雖然這種世界制度的建立在現實上是遙不可及的。²⁹

參、孫中山的王道理念與周邊國家關係

一國對成本增加所能承受的能力是有彈性的，若國家實力愈強，所能承受的戰略負荷，如戰略物資、財政、兵力等愈高，這些因素直接影響體系內一國權勢的存續。換言之，朝貢關係取決於宗主國權力

的上升，即決定於在區域內權力關係的突破過程。歷朝歷代統治者注重朝貢的政治和軍事意義，朝貢制度不單靠武力，還需要與「德」之間保持適當的平衡。明清之際，亞洲國家，不論國土大小、技術實力，都以中國為主要行為規範，以中國為中心運轉的國際體系中生存，不影響其獨立性。³⁰鴉片戰爭後，中西方開始碰撞，隨著中國實力衰落，儘管清朝依然和眾多國家保持著藩屬關係，然而，朝貢關係缺乏貿易支撐，已明顯走向衰落與崩潰。此時，長期存在的朝貢體系發生變化，與條約體系和殖民體系，同為世界三大國際關係模式。然而，霸道具破壞性和排它性，這與多元文化是矛盾的；王道是中華文化的精髓，追求文化上的感化、同化，不斷地吸收各種文化、制度的優點，達到最好的組合效果。³¹孫中山審時度勢，發現「王道」與「霸道」各有利弊，故其觀察當前國內外形勢，提出個人的王道理念，即兼具國防與經濟發展上的富國強兵和整合國際社會與凝聚人心的大同世界。

一、孫中山的王道理念

孫中山所處年代，是個打破舊傳統中國的封閉狀態，與國際世界強迫接觸與碰觸的發展形勢。初期組織興中會時，孫中山對強鄰和西方國家的欺凌，表現出強烈的不滿與憤慨，甚至有反強權、反侵略的思想。誠如他所言：「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蠶食鯨吞，已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用特集會眾以興中…是會之設，專為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³²民國建立後，孫中山認為：「今日國際，惟有勢力強權，不講道德仁義。」³³他引社會達爾文主義來說明，西方列強的侵略和強權之原由，即：「動物之強弱，植物之榮衰，皆歸之於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進化學者遂舉此例，以例人類國家。凡國家強弱之戰爭，人民貧富之懸殊，皆視為天演淘汰之公例。」³⁴又說：「世界僅有強權而無公理，後起學者隨聲附和，絕對以強權為世界唯一之真理。」³⁵換言之，孫中山認為中華民國正處於唯有強權、不講公理的帝國主義時代，國家要免於任人宰割，必須在國際社會上處於強勢

26 黃枝連，《天朝禮治體系研究（上卷）：亞洲的華夏秩序—中國與亞洲國家關係形態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1-5。

27 濱下武志，朱蔭貴、歐陽菲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頁38。

28 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58、64、150。

29 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04-106、118。

30 David C. Kang, Hierarchy, Balancing, and Empirical Puzzles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8/3 (Winter 2003/4), pp. 165-180.

31 武心波，〈王霸之辯與中國「軟實力」的戰略構想—從孫中山的「王道觀」談起〉，《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8年，第4期，頁102。

32 孫中山，〈檀香山興中會成立宣言〉，《國父全集（第二冊）》，秦孝儀主編（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頁1。

33 孫中山，〈駁保皇報〉，《國父全集（第二冊）》，秦孝儀主編（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頁242。

34 孫中山，〈民生主義（第一章）〉，《國父全集（第一冊）》，秦孝儀主編（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頁185。

35 孫中山，〈民生主義（第一章）〉，《國父全集（第一冊）》，秦孝儀主編（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頁185。

地位。正如他所說：「政府無振作也，人民不發奮也；政府若有振作，則強橫如俄羅斯，殘暴如土耳其，外人不敵側目也。」³⁶

孫中山晚年對儒家文化中的王道很感興趣，《民族主義》演講中說：「王道是順乎自然。…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團體便是民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團體，便是國家。」³⁷孫中山的王道理念，具中庸之道。引傳統中國倫理觀念中的「道義至上」的王道文化；另一方面，為反對列強的殖民壓迫，則順應世界政治、實業的發展趨勢，使國家國力與歐美並駕，甚至成為世界最強、最富的民族國家（孫中山王道理念之偏向，如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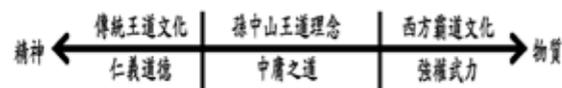


圖1 孫中山王道理念之偏向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換言之，孫中山的王道理念，為維護與追求國家利益，均衡國家間的關係，既要道義原則，反對濫用武力，儘量採取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既不放棄軍事手段的運用，要兼顧國家安全、政權穩定和國際優勢，發展農業和富國強兵，又不似西方國家「利益至上」的霸道文化，熱衷於佔領和衝突。

二、國際合作構想

36 孫中山，〈駁保皇報〉，《國父全集（第二冊）》，秦孝儀主編（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頁241。

37 孫中山，〈民族主義（第一講）〉，《國父全集（第一冊）》，秦孝儀主編（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頁4。

19世紀，西方列強爭相向海外擴張，劃分勢力範圍，據為殖民地；以強凌弱、以大欺小，奪取弱小國家的資源、勞動力、市場、土地。中國地廣人多，自滿清以後，受盡百年的羞辱，鄰國的日本也步入帝國主義之路。然而，弱國受人宰製固然苦不堪言，列強間爭權奪利，互不相讓，不免也走向戰爭，引爆兩次世界大戰。

在《建國方略》中，孫中山指出進化的過程，可分為物質進化、物種進化、人類進化三個時期。人類進化異於物種進化，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以互助為原則；社會國家為互助之體，道德仁義為互助之用。對於孫中山來說，人類之進化，已超過達爾文物種進化論的階段。人類進化是以「互助」取代物種進化的「競爭」原則。孫中山認為列強人數少，國力強盛，總是用政治力（軍事力量）和經濟力去侵略弱小的民族。據此，孫中山思考中國與世界和平的關係，提出國際合作的構想。

（一）經濟方面

在經濟上，中國國際地位低下，國家貧弱，列強瓜分變為共管，武力掠奪變為經濟壓迫。誠如他所說：「國際帝國資本主義侵略以來，農業經濟之上層建築物，小商店、家庭手工業等，皆為之破壞淨盡，而代以外國之大工廠、大商店，輸進外國

貨物於全國各商埠市場，而吸收中國之現金；同時又以關稅政策，阻礙中國國內出產品之輸出，使中國產業界陷於萎靡不振之狀態。……中國國家根本遂以搖動。而國際帝國主義者，欲達其以經濟滅亡中國之目的。」³⁸初期，孫中山提出向列強借款發展交通、實業等，然其洞察歐美列強不願中國在實業上取得進步，究其原因，無非是擔心中國實業之進步，將使彼歐美人在亞洲失去其實業上之勢力。他說：「日本現在的實業科學和種種文化都是比中國高，中國同日本合作之後，中國固然可以進步，日本當然要更進步。再由此更進一步，謀中日的經濟同盟，中國貨可以自由運進日本，日本貨可以自由運進中國，彼此暢銷，中國同日本的國民，在經濟上便有無窮的大利。日本國民要享這種大權利，要達到這種親善程度，便先要幫助中國廢除國際上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收回所有喪失的一切權利。」³⁹事實上，日本反而步入帝國主義的侵略思想和作為。

歐戰後，孫中山利用歐美國家自顧不暇，以及戰後資金、勞力、技術、物資無處可去之憂。故提出中國具有幅員廣大、人口眾多、礦產和農產雄厚等富源優勢，向西

方國家提出經濟合作和運用外資、外力、外才之道，即「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意在打破列強勢力範圍和消除商業戰爭與資本競爭。使中國走上富強，恢復獨立地位，同時也助西方國家經濟復甦，謀求世界和平。誠如他說：「中國不特可為各國餘貨消納之地，實可為吸收經濟之大洋海；凡諸工業國，其資本有餘者，中國能盡數吸收之。…近時世界戰爭，已證明人類之於戰爭，不論或勝或負，均受其殃，而始禍者，受害彌重。…吾更欲以國際共助中國之發展，以免將來之貿易戰爭。…此四萬萬人之中國，一旦發達工商，以經濟的眼光視之，何啻新闢一世界！…此種國際協助，可使人類博愛之情，益加鞏固，而國際同盟，亦得藉此以鞏固其基礎。」⁴⁰

朝貢關係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包括經濟利益、政治利益、文化交流和共同發展。朝貢關係衍伸出朝貢貿易，促進中國周邊地區的物資、人員和文化交流，進一步鞏固了周邊地區的安寧與穩固。孫中山說：「中國的政治思想便很高深，一般大言論家都極力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文字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有『棄珠崖議』。此項文章就是反對中國去擴充領土，不可

38 孫中山，〈組織農民協會及農民自衛軍宣言〉，《國父全集（第二冊）》，秦孝儀主編（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頁153。

39 孫中山，〈學生須贊成國民會議〉，《國父全集（第三冊）》，秦孝儀主編（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頁526。

40 孫中山，〈實業計畫〉，《國父全集（第一冊）》，秦孝儀主編（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頁428-429。

與南方蠻夷爭地方。…當時南洋各小國要來進貢歸化中國，是他們仰慕中國的文化，自己願意來歸順的，不是中國以武力去壓迫他們的。…南洋島那些小國，以中國把他們收入版圖之中，許他們來進貢，便以為是很榮耀。」⁴¹又說：「在暹羅的外交部和外交次長談話，所談的是東亞問題。那位外交次長說：『如果中國能夠革命，變成國富民強，我們暹羅還是情願歸回中國，做中國的一行省。』」⁴²綜上，孫中山認為處理當時中國與列強、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選擇用其王道理念，追求自身的富強，同時也克制自身權勢，維持區域秩序，構建經濟依賴雙贏局面。

（二）安全方面

王道與霸道在德與力的運用上，各有側重點。朝貢所攜帶的諸如國家間貿易、向周邊國家提供政治合法性及軍事保護等之類的附加功能。孫中山認為，中國很強盛的時候也沒有完全去滅人國家。因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是主張功利強權。講仁義道德是由正義公理來感化人，講功利強權是用洋槍大炮來壓迫人。孫中山以王道理念為中華民族提供處理國內和國際關係的準則，塑造中華民族的精神特

徵和奠定中華民族崛起的基調。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是為世界打不平的主義，中國強盛後，對世界負有「濟弱扶傾」責任。此外，孫中山又主張聯合世界弱小民族，共同奮鬥和反對帝國主義的掠奪和壓迫，切不可受西方世界主義的煽惑而放棄民族主義。他說：「他們的政治力和經濟力都很大，總是用這兩種力量去侵略弱小的民族。如果政治的海陸軍力不夠，便用經濟力去壓迫；如果經濟力有時而窮，便用政治的海陸軍力去侵略。……我們今日要把中國失去了的民族主義恢復起來，用此四萬萬人的力量，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列強因為恐怕我們有了這種思想，所以便生出一種似是而非的道理，主張世界主義來煽惑我們…我們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們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復起來之後，才配得來講世界主義。」⁴³

孫中山的王道理念在安全上，紮根於孔孟之道的德治觀念之上的朝貢體制，周邊國家如韓國、越南、日本、東南亞國家等因仰慕其文化和外交禮儀，而選擇自願臣服。與此同時，朝貢有時具有一定的軍事同盟性質，當屬國受到外族的軍事威脅而向宗主國求救時，具「霸道」表徵的武力征伐、軍事援助對朝貢國的國家安全意義

深遠，也是維持朝貢秩序的重要手段，如漢宣帝與烏孫聯合發動對匈奴戰爭。朝貢體系下，宗主國憑藉其強大的國家實力，擔任國際政府的角色，而不是採社會達爾文主義或霍布斯式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誠如孫中山說：「講到義字，中國在很強的時代也沒有完全去滅人國家。比方從前的高麗，名義上是中國的藩屬，事實是一個獨立國家……中國強了幾千年而高麗猶存，日本強了不過二十年便把高麗滅了，由此便可見日本的信義不如中國。」⁴⁴

此外，1924年，孫中山在日本講述《大亞洲主義》時說：「亞洲的文化就是王道文化。」⁴⁵他進一步指出：「我們今日在沒有發達之先，立定扶傾濟弱的志願，將來到了強盛時候，想到今日身受過了列強政治、經濟、壓迫的痛苦，將來弱小民族如果也受這種痛苦，我們便要把那些帝國主義來消滅，那才算是治國平天下。」⁴⁶孫中山的王道理念基於博愛精神，反對仇恨與種族壓迫，特別是國際間帝國主義對弱小民族的凌辱、侵略。可見，他所主張仁義的濟弱扶傾的國際政治策略，力圖實現天下為公、世界和平的理想目標。為了與日

本合作，實現以王道理念為核心的東亞聯盟。誠如1924年11月28日，孫中山北上途徑日本神戶，做《大亞洲主義》演講時，的確說過：「日本民族既得了歐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⁴⁷孫中山的王道是日本與中國平等相處，實現真正的和平，並不是要實現日本天皇領導下的王道。⁴⁸

總體來講，孫中山的王道理念幾乎很少干涉其它國家的內部事務，是互助、互利雙贏的，既滿足雙方的安全需求，又兼顧各自的利益需求。而中華民族要走向富強，孫中山強調：「要學歐洲的科學，振興工業，改良武器。不過我們振興工業，改良武器，來學歐洲，並不是學歐洲來銷滅別的國家，壓迫別的民族的，我們是學來自衛的。」⁴⁹所以，孫中山實現「大亞洲主義」必須以王道文化為基礎，兼學歐洲的科學技術以自衛。

三、和平的世界大同

孫中山講到歐美，認為其科學和物質文

41 孫中山，〈民族主義（第四講）〉，《國父全集（第一冊）》，秦孝儀主編（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頁34。
42 孫中山，〈民族主義（第四講）〉，《國父全集（第一冊）》，秦孝儀主編（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頁35。
43 孫中山，〈民族主義（第四講）〉，《國父全集（第一冊）》，秦孝儀主編（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頁33。

44 孫中山，〈民族主義（第六講）〉，《國父全集（第一冊）》，秦孝儀主編（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頁48。
45 孫中山，〈大亞洲主義〉，《國父全集（第三冊）》，秦孝儀主編（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頁539。
46 孫中山，〈民族主義（第六講）〉，《國父全集（第一冊）》，秦孝儀主編（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頁53。
47 孫中山，〈大亞洲主義〉，《國父全集（第三冊）》，秦孝儀主編（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頁542。
48 史桂芳，〈「東西方文明對立」下的東亞聯盟論〉，《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頁28。
49 孫中山，〈大亞洲主義〉，《國父全集（第三冊）》，秦孝儀主編（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頁540。

明比我們好；而政治哲學和道德文明遠不及我們。孫中山論述民族主義思想時，認為中國幾千年來都是實行「平天下」的主義，通過和平的手段去感化人，追求「王道」。他認為中國是文明的國家，由民族所結成的團體是王道的國家；而歐洲國家專講強權不講公理，是野蠻國家。誠如他所言：「中國征服別國，不是像現在歐洲人專用野蠻手段，而多用和平手段去感化人，所謂王道，常用王道去收服弱小民族。」⁵⁰又說：「中國更有一種極好的道德，是愛和平。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和民族，只有中國是講和平；外國都是講戰爭，主張帝國主義去滅人的國家。」⁵¹

孫中山說：「曰勵行種族同化，將以發達國內平等文明，收道一同風之效也。曰採用民生政策，將以施行國家社會主義，保育國民生計，以國家權力，使一國經濟之發達均衡而迅速也。曰維持國際平和，將以尊重外交之信義，維持均勢之現狀，以專力於內治也。」⁵²講到世界大道德，國家實力上升後，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成為國際社會中制序的維護者。而「中國四萬萬人是亞洲世界主義的基礎，有了基礎，然後才能擴充。」⁵³又說：「中華民

國之國民，均有國民之天職。何謂天職？即是促進世界的和平。此促進世界的和平，即是中華民國前途之目的。依此目的而進行，即是鞏固中華民國之基礎。……人人能盡職任，人人能盡義務……中國人民居地球四分之一，則凡有四人之地，即有一中國人民。況交通既便，世界大同，已有中外一家之勢。」⁵⁴

孫中山看到，西方鼓吹的世界主義具有種種「霸道」特質，與大同主義存在根本的區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孫中山揭示天下大同是人類進化的必然，指出人類進入文明後，天性所趨，向於互助之原則，以求達人類進化之目的。其目的，即孔子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正是基於進化理論，孫中山堅持大同信念，要與諸民族「並驅於世界，以馴至於大同」。他把實現大同理想作為《陸軍軍官學校訓詞》，寫道：「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

總體來看，中國一直處於實力優勢地位，對外戰略總體上傾向於防禦性。在這前提下，根據博奕理論的原理，中國對周邊國家有懷柔、征伐等兩種策略選擇，而周邊國家對中國有騷擾、臣服等兩種策略選

擇。ABCD 分別代表中國與周邊國家的行為組合中獲取的收益。顯而易見，當中國國家實力強大時，對周邊國家採取懷柔政策較征伐有利時，即 $A > C, B > D$ ；若中國選擇征伐，由於實力懸殊，周邊國家選擇臣服較騷擾更有利，即 $D > C$ 。反之，無論中國採取那種策略，周邊國家選擇臣服比選擇騷擾，較符合中國的利益，即 $B > A, D > C$ ；基於擴張成本上升問題，當周邊國家選擇臣服後，對中國而言，懷柔會比征伐更有利，即 $B > D$ 。綜上，雙方策略選擇受到國家實力、統治者對威脅的感知、統治者的戰略偏好等諸多因素影響，然而，中國採取懷柔，周邊國家採取臣服較符合納許均衡（中國與周邊國家之互動，如圖 2）。換言之，歐洲的世界主義是侵略主義，以帝國統治為目的，以保全帝國統治的特殊地位；中國的世界主義是不講打的好道德，不像歐洲專用野蠻手段，而多用和平手段去收服各弱小民族，最終達到世界大同的世界主義。

		周邊國家	
		騷擾	臣服
中華民國	懷柔	A	B
	征伐	C	D

圖 2 中國與周邊國家之互動

資料來源：周方銀，〈朝貢體制的均衡分析〉，《國際政治科學》，2011 年，第 1 期，頁 29-58。

肆、「一帶一路」的王道文化理念

全球化後，美國主導著世界，憑其經濟實力、優勢武力，依然強行其意志，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烏克蘭等地烽火四起，其結果既害到別人亦使自家受創。⁵⁵近年來，中國大陸崛起後，其經濟實力增強、文化軟實力與國家認同等問題日益明顯。伴隨著中國崛起，「中國威脅論」論調甚囂塵上，中共試圖處理周邊國家關係，積極推進睦鄰友好合作關係，並打消疑慮去說服國際上或區域上其他的國家，為解決當今問題，孫中山的王道理念提供一些啟示。孫中山作為近代中華民族主義復興的先驅，民族主義思想受到廣泛關注。其致力民族建國，復興中華，借鑒兼具傳統王道文化思想和朝貢體系的國際秩序之王道理念。企圖構建公平合理，國家相互間非強制性，且能確保國家的自由權利，又能避免國家間毀滅性的對抗，以實現中國大陸在國際舞臺和世界秩序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冀望和追求天下大同的崇高理想。

2013 年 9 月 7 日，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訪問哈薩克時，首次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在同年 10 月 3 日，訪問印尼時首次提出「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兩個倡議

50 孫中山，〈民族主義（第三講）〉，《國父全集（第一冊）》，秦孝儀主編（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 年），頁 26。

51 孫中山，〈民族主義（第六講）〉，《國父全集（第一冊）》，秦孝儀主編（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 年），頁 48。

52 孫中山，〈國民黨宣言〉，《國父全集（第二冊）》，秦孝儀主編（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 年），頁 35。

53 孫中山，〈民族主義（第四講）〉，《國父全集（第一冊）》，秦孝儀主編（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 年），頁 37。

54 孫中山，〈中國人之天職在促進世界和平〉，《國父全集（第三冊）》，秦孝儀主編（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 年），頁 25。

55 汪榮祖，〈以王道取代霸道：中國崛起在世界上的角色〉，《國際漢學》，2017 年，第 3 期，頁 24。

被中國大陸官方合稱作「一帶一路」倡議。同年 11 月 12 日，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一帶一路」首次被寫入中共中央的決策檔，即《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自此正式成為國家級規劃，並且形成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新格局。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戰略是推行孫中山王道理念，一種互助、平等的關係，中國大陸不與國際社會任何成員為敵，構建一種新型的國際秩序。這不同於美國不斷樹立敵人的發展模式，通過武力使得對手屈服；孫中山王道理念有助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同時也有助於打破現在以西方國際「霸道」的國家性格而構建的現行國際秩序。⁵⁶

一、「一帶一路」背景與內涵

「一帶一路」賦予古絲綢之路新的時空意義，它為中國大陸國內全面深化改革塑造了新的外部環境；同時，也為中國大陸全方位開放提供了空間和方位，重新整合歐亞大陸和沿海合作，為世界繁榮描繪一幅 21 世紀的新圖景。「一帶一路」具有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聯繫和往來，它承載著不同文化、語言、技藝、傳統和國家人民間的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精神。這需要孫中山的王道理念與「一帶一路」相結合，讓這條友誼

之路、傳奇之路惠及沿線各國，進而成為 21 世紀的和平之路、合作之路、共贏之路。

2018 年 8 月 27 日，中國大陸國務院發佈「一帶一路」五年來各項建設進展情況，據統計目前已與 103 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 119 份合作協定；2015 年 3 月 28 日，發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遠景與行動》以來，「一帶一路」帶動地區整體發展，像擴大地區投資和內需、增加就業、減少貧困等；2017 年 5 月，全球五大洲，共計 130 多個國家、70 多個國際組織、29 國元首或政府重要領導者、1500 多名代表齊聚北京參與「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取得 279 項成果中，已有 265 項已完成或轉為常態工作，餘 14 項正督辦推進中。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已逐漸從中國大陸倡議、雙邊行動走向多邊倡議，如被聯合國、上海合作組織、二十國集團等重要國際會議和機制納入（「一帶一路」推動主要過程，如表 1）。⁵⁷

「一帶一路」可分陸路和海路，大陸推動陸路時，雖然沿線國家政治不穩、充斥著恐怖主義、宗教和民族等問題，整體上態度都較為和平友好，無特別明顯的敵對勢力，如中亞五國、中東、西亞大部分國

表 1 「一帶一路」推動主要過程

時間	主要內容
2013. 9	習近平訪問哈薩克首次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
2013. 10	習近平主席在印尼又提出，“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2013. 11	在三中全會，首次將“一帶一路寫入中央決策檔”
2014. 3	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就“一帶一路”提出“抓緊規劃建設”
2014. 11	發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成立計畫
2014. 12	絲綢之路基金有限責任公司成立
2015. 2	- “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首次亮相（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擔任組長） - “一帶一路”被 31 個省份寫入當年政府工作報告
2015. 3	- 《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佈
2015. 7	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NDB）設立
2015. 12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正式成立
2016. 3	把“一帶一路”作為核心國家項目被包括為“十三五”規劃
2016. 8	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座談會首次召開
2016. 10	人民幣正式納入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特別提款權（SDR）
2016. 11	聯合國大會 193 個會員國把“一帶一路”構想全場一致通過，“一帶一路”首次寫入聯合國大會決議
2017. 5	第一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舉行
2017. 10	習近平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作報告中五次提及“一帶一路” - “一帶一路”寫入修訂後的《中國共產黨章程》
2018. 1	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
2018. 9	中國非洲合作論壇北京峰會開幕
2019. 4	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舉行

資料來源：鄭昊慶，《「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經濟合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博士論文，2019 年 5 月），頁 27-28。

家均與中國大陸保持友好關係；大陸推動海路時，風險極大，尤其美國是推動東海與南海潛在的阻力。中美間價值觀與戰略矛盾極大，且中美之間牽涉太多經濟、社會、文化上的合作與互動，有著千絲萬縷的大國關係，甚至還牽涉到許多其他國家。⁵⁸不同國家彼此正受著各種複雜的社會、歷史等因素的制約，中國大陸秉承著與周邊國家維持和平主張和原則，特別是東亞地區的合作與進展。

二、「一帶一路」之框架與路線

（一）「一帶一路」框架

第一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將「一帶一路」模糊的倡議理念和框架，具體地訂定出一個總體目標、一個原則、三大使命、五條道路和八大合作領域，明確了實施目標、方式和導向國際合作的實踐和平臺。就總體目標來看，在《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中明確地說明，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命運和責任的共同體。就一個原則來看，就是「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內容的「十六字絲路精神」，其

56 唐學軍、陳曉霞，〈後美國時代的中國思維與戰略定位—以華夏性格塑造「王道中國」〉，《山西師大學報》，2014 年 5 月，第 42 卷，頁 144。

57 張偉玉，〈「一帶一路」倡議五周年：建設成果、風險挑戰及應對措施〉，《海外投資與出口信貸》，2018 年，第 5 期，頁 3-7。

58 汪榮祖，〈以王道取代霸道：中國崛起在世界上的角色〉，《國際漢學》，2017 年，第 3 期，頁 24。

核心內容強調互利共贏。就三大歷史使命來看，就是肩負著全球化再平衡、歐亞大陸再聯通，以及中國改革開放再出發等使命，並通過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方式解決當前世界性難題和困境。就五條道路來看，即建成和平之路、繁榮之路、開放之路、創新之路和文明之路等價值，體現將自身發展目標、環境、路徑與世界共用、共建的努力和決心。就八大合作領域來看，包括促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提升經貿合作水準、拓展產業投資合作、深化能源資源合作、拓展經營合作領域、拓展人文交流合作、加強生態環境合作、積極推進海上合作等，標誌著「一帶一路」從頂層設計推進務實合作，從概念理論到實踐理論的發展階段（「一帶一路」框架，如表 2）。⁵⁹

（二）「一帶一路」路線

「一帶一路」被視為 21 世紀東西方在經濟貿易、文化交流上的重要通道，兩端連接的是新崛起的東亞經濟圈和發達的歐洲

經濟圈，中間則是具有發展願望、追求和平、實現富裕的眾多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一帶」主要是指陸上經濟帶的建設，主要以沿線國的中心城市為重要節點，創建新的歐亞大陸橋和國際經濟合作走廊；「一路」是強調海上合作，則主要以沿線主要城市和港口為支撐，建設安全高效順暢的國際運輸大通道。⁶⁰「一帶一路」橫跨亞歐非三大洲的經濟走廊，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具發展潛力的經濟地帶。「一帶一路」連通東亞、中亞、東南亞、南亞、西亞、歐洲，甚至非洲和西太平洋地區，連接亞太、歐洲經濟圈，覆蓋全球人口約 60% 以上，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三分之一，貿易額四分之一（「一帶一路」六大經濟走廊，如表 3）。⁶¹通過「一帶一路」建設，能夠把中國大陸的發展與沿線各國的發展對接起來，讓周邊國家與中國共同發展。⁶²

三、「一帶一路」對外擴大與安全之王道考量

表 2 「一帶一路」框架

一個總目標	命運共同體						
一個原則	十六字絲路精神（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						
三大使命	全球化再平衡		歐亞大陸再聯通		中國改革開放再出發		
五條道路	和平之路	繁榮之路	開放之路	創新之路	文明之路		
八大合作領域	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經貿合作	產業投資合作	能源資源經營合作	人文交流	生態環境	海上合作

資料來源：鄭吳慶，《「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經濟合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博士論文，2019 年 5 月），頁 29。

59 張宇燕、李東燕、鄧治波，《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 2018》（上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年），頁 168-181。
60 鄭吳慶，《「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經濟合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博士論文，2019 年 5 月），頁 29-30。
61 〈美智庫：全球氣候治理十字路口「一帶一路」倡議給出中國方案〉，《中國日報網》，2018 年 12 月 6 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interface/zaker/1142822/2018-12-06/cd_37363709.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10 日）。
62 袁新濤，〈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國家戰略分析〉，《東南亞縱橫》，2014 年，第 8 期，頁 3-4。

表 3 「一帶一路」六大經濟走廊

新亞歐大陸橋經濟走廊	中國→中國西北地方→俄羅斯→東歐
中蒙俄經濟走廊	中國→蒙古→俄羅斯
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	中國西北地方→波斯灣→阿拉伯半島→地中海
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	中國西南→中南半島各國
中巴經濟走廊	中國→巴基斯坦
孟中印緬經濟走廊	連接東亞-南亞-東南亞 溝通太平洋-印度洋

資料來源：〈六大經濟走廊〉，《中國一帶一路網》，2018 年 7 月 20 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zchj/rcjd/60644.htm>（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10 日）。

一般來說，國際關係具有複雜性、多樣性，兩國間的關係由諸多因素構成，更何況「一帶一路」是一個巨大的全球性倡議，牽涉到 100 餘國的參與，存在著極大的變數。一旦相關國家間發生外交或其他問題，彼此間的合作關係，將會受到很大的影響。中國大陸提出「一帶一路」倡議，落實孫中山的王道理念，化解區域外大國的幹擾與挑戰外，也與周邊國家攜手建設，形成命運共同體和全方位開放格局。

（一）經濟合作方面

針對「一帶一路」倡議，中國大陸所提出的《願景與行動》中，所謂的「五通」，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五項，是與相關國家合作的主要標準。對外來說，中國大陸一直推動「引進來-走出去」概念，其「十三五規劃」中明顯把對外經濟的方向從「貿易

63 〈十三五規劃綱要〉，《中國科技網》，2018 年 1 月 4 日，http://www.stdaily.com/zhuanti01/guojia/2018-01/04/content_617866.s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10 日）。

大國」轉到「貿易強國」。

2013 年，發表「一帶一路」倡議後，更強調地域經濟合作，致力與韓國、印尼、馬來西亞、泰國、汶萊、斯里蘭卡、印度、巴基斯坦、越南和緬甸等國的交流。具體來說，促進外國人投資、擴大自由貿易區、開放服務及金融、加強合作自由貿易協定、促進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推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推進亞太自由貿易區建設等。⁶³

若「一帶一路」倡議正常進行的話，能確保地域經濟合作的主導權；同時把中國發展模式塑造成全球化，與世界相互聯動，具備世界經濟的主導權。然而，構建「一帶一路」經濟的過程，引起霸權國家的不安與競爭。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大陸選擇「不戰而屈人之兵」，就是不採用從前歐洲和美國的掠奪性帝國主義方式，而是以創新的、共贏的王道思想為中心，建設新的全球性經濟合作模式。這就是在國際社會上不追求領導能力，卻自然而然成為領導的方式。

綜上，「一帶一路」貫穿歐亞陸上絲綢之路的建設，以及像一條珍珠項鍊般的海上貿易路，將中國大陸、歐洲、東南亞、印度、非洲等沿線國家連接在一起，塑造

成一個巨大的經濟圈、文化圈、生活圈。中國大陸推進「一帶一路」不是用壓制的方式，因為單單使用力量，沒有道德或正當性的話，最終將會失敗。面對「一帶一路」新模式時代，中國大陸以道德和名義為重心，這樣的脈絡下，制定新規則，進而擴大實力。換言之，中國大陸的加速崛起，在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不斷地思考完善自身發展，為消除國際社會的疑慮和擔憂，塑造「王道中國」的國際形象，是傳遞其國家戰略思維和定位。⁶⁴

（二）國家發展戰略方面

其實全球唯有共立、共達、共富、共榮、共贏，才能共和、共樂、共安、共用。若霸道主義霸權盛行，恐怖活動頻發不止，惡性事件屢發不斷，則人民大眾無寧日，世界無寧日。若以德治仁政治理天下，以公平正直處理世事，才符合王道原則。⁶⁵二次大戰後，各國間進行和平合作與協調，世界經濟繁榮發展，不再局限於商品貿易為主的貿易結構。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高速發展，伴隨著呼籲民族復興和恢復傳統文化，中國大陸爭霸是「自然結果」的言論不脛而走。原因在於，歷史上

英、法、德、日、美等國，都是歷經工業化和經濟快速增長後，同時也走向對外擴張的道路，按歐美國家的推論邏輯，中國大陸崛起後，勢必走相同的路徑。習近平曾指出：「不認同『國強必霸』的陳舊邏輯，只有和平發展道路可以走得通。」⁶⁶

過去幾年，東亞安全局勢令人堪憂，如朝鮮半島南北雙方在統一問題上的分歧；中日釣魚台問題；與東南亞國家的南海爭端；域外美國的重返亞太或印太戰略等。2013年，日本參與「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後，中國大陸認識到必須牽制美國主導的多邊貿易協定 TPP，確保地區經濟一體化的主導權。習近平在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CICA）指出：「亞洲事務應該由亞洲國家主導解決，亞洲國家有能力、有智慧通過加強合作來維護和促進亞洲的安全。」⁶⁷其中，習近平的「亞洲」，有著強烈的排除外部勢力，這對回歸亞洲戰略的美國來說，彼此的合縱連橫，將挑戰到霸權國的地位。

其次，國家發展戰略有政治、經濟、社會、科技、文化、國防等各領域的發展戰略，是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⁶⁸縱觀中國大

陸近幾十年的發展戰略，已逐步從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三步走」；向中共十九大時，綜合分析國際和國內形勢，以及中國大陸發展條件，提出「新兩步走」的發展戰略轉變。⁶⁹東亞地區各國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價值等方面的差異，「一帶一路」倡議常被拿來與「歐亞經濟聯盟」、韓國的「新北方政策」等作為化解困境、對接或機會評估。⁷⁰此外，中國大陸企業「走出去」戰略，以及各省在「一帶一路」中的結合、地位及對外合作方向等。很大程度上，可發現王道思想與國際秩序，以及「一帶一路」的主流價值接軌與融合，可作為完善國際環境、國際秩序和經濟繁榮之貢獻。

綜上所述，從全球治理角度看，「一帶一路」在經濟發展或國際戰略上，與某些國家或國際組織具有契合點，以政策協調為主要手段，以「五通」作為實施內容，進行自願的經濟合作行為。⁷¹摒棄一些不平等的成分後，在不使用武力解決爭端的情況下，互惠互補、包容與親和，在避免走向德與力兩個極端下，在國際秩序與安全上，建立起一種全新的共有利益。

伍、結論

69 新「兩步走」引領偉大復興新征程，《大眾網》，2017年10月30日，<http://paper.dzwww.com/dzrb/content/20171030/Article105005MT.htm>（檢索日期：2020年8月10日）。

70 趙洪，〈「一帶一路」與東盟經濟共同體〉，《南洋問題研究》，2016年，第4期，頁15-16。

71 程大為，〈如何理解「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對接策略」〉，《人民論壇》，2017年，第17期，頁84-86。

中華文化的精髓是王道精神，中美之間的矛盾不是霸權挑戰霸權，而是中國大陸要以王道來對付霸道，就不會有「修昔底德陷阱」的問題。孫中山的王道理念，貫穿古今，連接中外，既是傳統，又是現代，著眼於國際社會在平等的基礎上和諧發展；其思路和構想，既是國家的，又是國際的；既是民族主義，又是世界主義；既是現實主義，又是理想主義。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有關國家大部分面臨著資金不足、技術不足等自身發展乏力的致命問題。為解決這些問題，中國大陸扮演外部勢力與其經濟合作來突破，現已在鐵路、公路、水電站、自由貿易區等多方面推動合作。西方國家因諸多疑慮，提出「中國威脅論」的基調，宣稱「一帶一路」只是為了中國大陸的利益。實際上，筆者認為，中國「一帶一路」善用王道理念中的「天下有道」之精隨，與周邊國家建立信任和鞏固親密關係，支援鄰國建設的「睦鄰、安鄰、富鄰」；對域外國家提出「永不稱霸」，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論述，建立互信，深化合作，實現互利共贏的新安全合作機制。此外，在東亞地區勾畫出秩序建構的藍圖，建立起合作的責任體系，摒除國家意識的偏見，確保地區的秩序。

64 唐學軍、陳曉霞，〈後美國時代的中國思維與戰略定位—以華夏性格塑造「王道中國」〉，《山西師大學報》，2014年5月，第42卷，頁142。

65 張立文，〈王霸之道與和合天下〉，《學術前沿》，2016年10月，下冊，頁81。

66 陳安傑，〈和平發展道路：中國走向未來的歷史謀劃〉，《雲南行政學院學報》，2015年，第2期，頁92。

67 習近平將出席並主持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第四次峰會，《人民網》，2014年4月29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429/c1024-24958188.html>（檢索日期：2020年8月10日）。

68 熊武一，周家法主編，《軍事大辭海（下）》（北京：長城出版社，2000年），頁1874。

